論《唐詩別裁集》的“諸體兼善”說*

陳美朱

提 要

沈德潛在《唐詩別裁集·凡例》曾提出：“唐人詩，無論大家名家，不能諸體兼善”的論點，並以杜甫絕句少唱歎之音，韋應物不善七言，劉禹錫不工古詩，韓愈不專近體作為例證。以上論點並見於《別裁集》初刻本與重訂本，並未因《別裁集》的重訂而有所調整，堪稱是沈德潛一以貫之的詩學論點。

但在深入檢視《別裁集》的選詩內容後發現，初刻本中各種詩體都被選錄的詩家高達10人，重訂本也有9人之多。可見唐代詩家若真如沈德潛所謂“無論大家名家，不能諸體兼善”，然則選本中高達十位詩家“諸體兼選”的現象，不免令人生疑。此外，結合卷前凡例與相關評語，可發現沈德潛對於唐代詩人王維的各體詩作，均未有負面評論，但若以王維為《別裁集》中“諸體兼善”之代表，何以王維在《別裁集》的選詩總數低於杜甫、李白？再者，“諸體兼善”與杜甫的“集大成”的稱譽又有何不同？本文透過“諸體兼善”說，重新檢視這本在清代深具影響力的唐詩選本，除了釐清以上問題外，也期能對王維在“以李、杜為宗”的《別裁集》所呈現的樣貌，以及沈德潛對王維詩歌的評價，進行全面性的考察與詮釋。

關鍵詞：沈德潛 唐詩別裁集 王維 諸體兼善 辨體

* 本文承蒙科技部107年度計畫案(MOST 107-2410-H-006-081-)補助，以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意見，謹致誠摯謝忱！

一、前言

《唐詩別裁集》(以下簡稱《別裁集》)一書,是清人沈德潛(1673—1769)與友人陳培脉(字樹滋)於康熙五十六年(1717)合選而成。原書僅有十卷,選詩一千六百餘首。¹ 沈德潛於乾隆二十八年(1763)重新刊訂本書,由書前《重訂唐詩別裁集序》云:“成詩二十卷,得詩一千九百二十八章”,²可見重訂本的卷數與收錄詩作都要比初訂本來得多。本書在清代乾隆年間,有“一洗歷下、竟陵之陋,海內承學者幾於家有其書”³的稱譽,其流傳的深遠與普及程度不難想見。當代學者評論此書,多肯定其取材廣博、評論精當,如陳伯海謂其:“編選宗旨明確,取材面又較寬,遂使此書成爲一部主調鮮明而亦能兼顧多樣風格的唐詩選本。”⁴孫琴安也稱許本書:“專主雄渾闊大,同時亦兼及神韻、體裁各項,選面比較寬,許多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都能收進,確能較全面地概括唐詩的面貌。”、“其評論之精,非一般選家所及”。⁵概要地揭示了本書的選評特色與成就。

由於《別裁集》在清代頗具影響力,加以具有取材廣博、選評精當的特點,成爲學界的熱門研究選本,迄今對本書的研究已累積相當豐厚的成果,⁶但仍多就書中的選詩理念與選詩特色而發,迄未有深入討論沈德潛

1 參見陳培脉於《唐詩別裁集》初刻本卷前序文所言:“予與沈子始之,予中之,沈子終之,成詩十卷,得一千六百餘首。”按:本文參考的《唐詩別裁集》初刻本,乃康熙五十六年碧梧書屋藏版,臺北故宮博物院善本古籍庫館藏。

2 清人沈德潛《唐詩別裁集》重訂本(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7年),卷前,頁2a。本文除非特別註明爲初刻本,否則引用內容皆出自重訂本。

3 清人朱景英《唐詩別裁集箋注序》,引自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頁331。

4 陳伯海:《唐詩總集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頁727。

5 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頁320—321。

6 筆者檢索《中國知網》,以“主題”爲檢索值,得到與“唐詩別裁”相關的資料(含期刊論文與學位論文)有63篇,其中以“唐詩別裁集”爲博士學位論文主題者有1篇,以之爲碩士學位論文者有3篇(2018年11月30日上網)。臺灣地區以“唐詩別裁”爲學位論文主題者有1篇,期刊論文則有11篇(2018年11月30日上網)。

《別裁集·凡例》以下這段話：

唐人詩無論大家名家，不能諸體兼善。如少陵絕句，少唱歎之音；左司七言，詘渾厚之力，劉賓客不工古詩，韓吏部不專近體。

引文中，沈德潛以杜甫絕句少唱歎之音，韋應物不善七言，劉禹錫不工古詩，韓愈不專近體作為“唐人詩不能諸體兼善”的例證。比對《別裁集》初刻本與重訂本卷前《凡例》，以上說法可謂一以貫之，並未因沈德潛重訂《別裁集》而有所變動、調整。

然而，深入檢視《別裁集》的選詩內容，初刻本中各種詩體至少選錄 1 首的詩家高達 10 人，重訂本也有 9 人之多（詳見下述）。唐代詩家倘若真如沈德潛所謂：“無論大家名家，不能諸體兼善”，選本中何以有眾多詩家“諸體兼選”的情形？其中甚至包括沈德潛點名批評“少唱歎之音”的杜甫絕句，究竟“諸體兼選”與“諸體兼善”在選本中有何不同？是本文所要探討的重點之一。

由於選本是選詩者的詩學理念延伸，透過選本中的詩人與詩體選錄情形，能客觀呈現出選家對該位詩人的評價。在整理、歸納《別裁集·凡例》的相關評語後，筆者留意到杜甫、李白、王維是《別裁集》中選詩數量最高的前三人，其中杜甫因絕句不工，五、七言絕句遂僅各選 3 首；李白七律因創作量少，目前所見僅有 8 首，兼且好“以古筆為律詩”，⁷ 導致沈德潛在《別裁集·凡例》論及七律代表詩家時，隻字未提李白，選本所錄李白各體詩，也以七律 4 首最低。但綜觀卷前《凡例》與各卷所附評語，均未見沈德潛對王維有何“不工”的負評。然而，若據此徑謂王維為《別裁集》中“諸體兼善”者，必須釐清的問題是：何以《別裁集》於王維“七絕”僅選錄 4 首？且其選詩總數僅 104 首，低於杜甫的 255 首與李白的 140 首？再者，“諸體兼善”與杜甫之“集大成”的稱譽，兩者在本質

7 李白現存 8 首七律，分別是：《贈郭將軍》、《寄崔侍御》、《別中都兄明府》、《送賀監歸四明應制》、《登金陵鳳凰臺》、《鸚鵡洲》、《題雍丘崔明府丹灶》、《題東溪公幽居》。引文為沈德潛評李白七律《鸚鵡洲》，見《別裁集》，卷 13，頁 15b。

上有何不同？本文擬透過“諸體兼善”說，重新檢視王維在以“李、杜為宗”的《別裁集》中所呈現的樣貌與評價。至於本文的研究方法，除了借助表格整理選詩數據外，也結合了沈德潛的詩觀進行論述，相信不僅有助於呈現論題，也方便梳理《別裁集》對王維詩的選評矛盾。

二、《唐詩別裁集》之“諸體兼善”與“諸體兼選”

《別裁集》全書按詩體分卷編次，共選錄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排、五絕、七絕計七種詩體。筆者整理後發現：初刻本共有 10 位詩家在以上七種詩體中，每體至少選錄一首，可說是“諸體兼選”，但在重訂《別裁集》時，沈德潛刪去了韋應物的五排 1 首，導致《別裁集》重訂本“諸體兼選”的詩家僅剩以下表列九位：

表一 《唐詩別裁集》諸體兼選的詩家及選錄情形

排名	詩人	五古	七古	五律	七律	五排	五絕	七絕	合計
1	杜 甫	53	58	63	57	18	3	3	255
2	李 白	42	37	27	4	5	5	20	140
3	王 維	23	9	31	11	10	16	4	104
6	岑 參	6	13	17	6	4	3	9	58
7	劉長卿	6	4	20	11	6	3	4	54
10	柳宗元	21	4	2	5	1	4	4	41
11	孟浩然	10	1	22	1	1	1	1	37
12	錢 起	6	2	8	5	4	2	3	30
15	高 適	2	10	4	3	2	1	3	25

表格數據資料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兩點：

其一，就選錄數量而言，杜甫、李白、王維高居選本前三名，且選詩總量均高達三位數以上，除了某些特定詩體，如杜甫的五、七言絕，李白的七律、五排、五

絕，王維的七絕、七古，選錄數量較低，僅有個位數，其餘都有兩位數以上的入選量。

其二，杜、李、王以外的六位詩人，雖然也是“諸體兼選”，但與杜、李、王三家不同的是，六位詩人除了少數一、兩種詩體選錄較多，如岑參的七古、五律，劉長卿的五、七律，柳宗元的五古，孟浩然的五古、五律，錢起的五古、五律，高適的七古，其餘低者僅見 1 首，高者亦不超過 6 首，尤其是中唐詩人錢起，各種詩體的入選數量均未超過 10 首。

由此可見，儘管《別裁集》中有高達九位詩人“諸體兼選”，但杜、李、王三家只有少數詩體選量偏低，其餘六位詩家恰好相反，僅少數詩體選量較高，多數詩體的選錄不過聊備一格而已，與杜、李、王三家遙遙領先的地位是不可同日而語、相提並論的。可見即使“諸體兼選”，在《別裁集》中也有不同層次的差別，既然如此，何以《別裁集》中會有高達九位詩人出現“諸體兼選”的情況呢？

首先，歸納這些詩人的時代背景，都是盛、中唐時期的重要詩家。入選量高居選本前三名的杜甫、李白、王維，固不待言，其餘詩家在選本中的排名也都分列前 15 大，各自有其擅長的詩體與貢獻。如孟浩然的五律與李白、王維“分道揚鑣，並推極勝”；⁸高適、岑參的七古，與王維並列為一體，⁹劉長卿的五律“工于鑄意，巧不傷雅”，七律則“工絕亦秀絕”，是盛、中唐詩轉變時期的關鍵人物；¹⁰柳宗元的五古，為唐人祖述陶（潛）詩而“得其峻潔”¹¹者；錢起的五古則是“仿佛右丞而清秀彌甚”，¹²足見《別裁集》中“諸體兼選”的詩家，在唐詩發展

8 沈德潛謂孟浩然五律：“開、寶以來，李太白之穠麗，王摩詰、孟浩然之自得，分道揚鑣，並推極勝。”《別裁集》，卷 9，頁 24a。

9 沈德潛將唐人七古分為四體，其中“王、李、高、岑四家，馳騁有餘，安詳合度”，並列為初唐之後、李白、杜甫、韓愈之前的一體（《別裁集·凡例》論“七古”）。

10 沈德潛論劉長卿五律云：“中唐詩近收斂，選言取勝，元氣不足，體格卑而聲調亦降矣。文房工於鑄意，巧不傷雅，猶有前輩手段。”《別裁集》，卷 11，頁 1a。而論劉長卿“七律”，亦云：“七律至隨州，工絕亦秀絕矣，然前此渾厚兀莽之氣不存。”《別裁集》，卷 14，頁 7b。

11 《別裁集·凡例》論唐人五古述陶潛詩者，分別有：“王右丞得其清腴，孟山人得其閒遠，儲太祝得其真朴，韋蘇州得其沖和，柳柳州得其峻潔。”

12 沈德潛雖謂錢起五古“仿佛右丞”，卻又指出：“然右丞所以高出者，能沖和、能渾厚也。”《別裁集》，卷 3，頁 10a。

史上,不僅對不同詩體的演變有重要貢獻,也因詩家並稱(如王、孟;高、岑;錢、劉),不易軒輊、高下,遂有兼容並納的情形。

其次,《別裁集》重訂本選詩 20 卷計 1940 首,¹³稱得上是一部體大思精的選本。由於選詩數量龐大,加以表列“諸體兼選”的詩人,入選數量又集中在選本的前 15 名,大大提高了詩家“諸體兼選”的機率。相對的,若選詩數量大幅精簡,“諸體兼選”的比例是否也會隨之降低呢?取《別裁集》“諸體兼選”的詩人名單,與《唐詩三百首》¹⁴的選錄情形比對參照,應可印證這一點。

表二 《別裁集》諸體兼選者在《唐詩三百首》的選錄情形

排名	詩人	五古	七古	五律	七律	五絕	七絕	合計
1	杜 甫	5	9	10	10	1	1	36
2	李 白	6	9	5	1	3	5	29
2	王 維	5	3	9	4	5	3	29
9	岑 參	1	3	1	1	0	1	7
6	劉長卿	7	0	2	1	1	1	12
11	柳宗元	2	1	0	1	1	0	5
4	孟浩然	3	1	9	0	2	0	15
13	錢 起	0	0	2	1	0	0	3
14	高 適	0	1	0	1	0	0	2

就以上表格所列詩體而言,《唐詩三百首》較《別裁集》少了“五排”一體。

- 13 沈德潛在《重訂唐詩別裁集序》自言“成詩二十卷,得詩一千九百二十八章”,但筆者依據香港中華書局 1977 年出版的《別裁集》教忠堂本,實際統計各體選詩數量為 1940 首。推論實際數目所以與序言之所以有出入,或許是因版本不同所致,抑或是沈氏對於“一題數首”的詩作統計有誤使然。
- 14 本文所參考的版本,為清孫洙(蘅塘退士)原編,清陳婉俊輯注:《唐詩三百首補注》(北京:中國書店,1991年)。按:依本書卷前署名“四藤吟社主人”的序文所云:“少陵《詠懷古蹟》,詩本五首,蘅塘止錄其二,不免絳漏,今刻仍為補入,俾讀者得窺全豹。”可見孫洙於杜甫《詠懷古蹟》五首,原本只錄詠昭君與詠孔明二首,連帶的,陳婉俊補注本選錄杜甫七律 13 首,但孫洙原書實則僅選 10 首。

由於排律結合了古詩的鋪排章法與律詩的格律聲調，在創作手法上，誠如《別裁集·凡例》所謂：“貴嚴整，貴勻稱，貴屬對工切，貴血脈動盪。”是難度頗高的詩體，也是選本中詩家“諸體兼選”的重要門檻，以韋應物與劉禹錫的詩作在《別裁集》的入選量為例，儘管兩家分居選本的第4名與第13名，但因“五排”選錄掛零，遂無緣躋身“諸體兼選”的行列。以此類推，《唐詩三百首》少了創作難度較高的五排，按理應能大幅提升詩家“諸體兼選”的機率，實則不然。表格二中，除了杜、李、王三家仍然維持“諸體兼選”的情形，其餘六位詩家，各自都有選錄掛零的詩體，從中不難理解：選本規模大小，亦即選詩數量多寡，與詩家“諸體兼選”的比例是密切相關的。換言之，選本規模愈大、選詩數量愈多，“諸體兼選”的詩家也會大幅提高，由《別裁集》有高達九位詩家“諸體兼選”，《唐詩三百首》卻僅有杜、李、王三家，足證以上所言不虛。

三、《唐詩別裁集》“諸體兼善”的人選

(一) 杜、李兩家在《別裁集》中未能“善”的詩體

理解了選本中“諸體兼選”可能涉及的因素，包括詩家並稱與選本規模大小，何況“諸體兼選”偏重的是各體詩皆有入“選”，某位詩家即使每種詩體僅選錄1首也算數，但“諸體兼善”著眼的不僅是各種詩體的選錄，更強調的是能在各種詩體的創作表現上稱“善”，亦即能成為各種詩體的創作典範。也因此，《別裁集》中“諸體兼選”並不同於“諸體兼善”的意涵。既然杜、李、王以外的六位詩家，在《別裁集》中實際僅擅長一至兩種詩體，要探究《別裁集》真正“諸體兼善”者，還是得由選詩數量高居選本前三名的杜、李、王作進一步篩選。

結合表格一的選錄數據來看，杜甫的“五、七言絕句”，李白的“七律、五排、五絕”，王維的“七絕、七古”，是三人在《別裁集》中少數僅選錄個位數的詩體，而這些是否就是沈德潛所認定的杜、李、王“不工”的詩體呢？有待透過選本中的評語加以驗證。

表三 《唐詩別裁集·凡例》對杜、李、王各體詩評語

五古	(初唐)陳子昂、張九齡、 李白 “唐體中能復古者,以三家為最”。 唐人祖述(陶)者, 王右丞 得其清腴,孟山人得其閒遠,儲太祝得其真朴,韋蘇州得其沖和,柳柳州得其峻潔。 蘇、李十九首以後,五言所貴,大率優柔善入,婉而多風, 少陵 材力標舉,篇幅恢張,縱橫揮霍,詩品又一變矣。
七古	初唐風調可歌,氣格未上,至 王、李(頎) 、高、岑四家,馳騁有餘,安詳合度為一體。 李供奉 鞭撻海岳,驅走風霆,非人力可及,為一體。 杜工部 沈雄激壯,奔放險幻,如萬寶雜陳,千軍競逐,天地渾奧之氣,至此盡洩,為一體。
五律	開、寶以來, 李太白 之穠麗, 王摩詰 、孟浩然之自得,分道揚鑣,並推極勝。 杜少陵 獨開生面,寓從橫顛倒於整密中,故應超然拔萃。
七律	摩詰 、東川,春容大雅,時崔司勳、高散騎、岑補闕諸公,實為同調,而大歷十子及劉賓客、柳柳州,其紹述也。 少陵 胸次闊闊,議論開闢,一時盡掩諸家,而義山詠史其餘響也。
五排	王、楊、盧、駱、陳、杜、沈、宋、燕(張說)、許(蘇頌)、曲江(張九齡),並皆佳妙, 少陵 出而瑰奇宏麗,變動開合,後此無能為役。
五絕	五言絕句, 右丞 之自然, 太白 之高妙,蘇州之古澹,純是化機,不關人力。
七絕	開元之時,龍標、供奉,允稱神品,外此,高、岑起激壯之音, 右丞 作多悽惋之調,以至“蒲桃美酒”之詞,“黃河遠上”之曲,皆擅場也。

以上表格中,與杜、李、王三家相關的評論,幾乎貫穿各種詩體,少數例外的情形是:

首先,杜甫絕句被剔除在及五、七言絕句的代表詩家名單之外。此舉與表格一選杜甫的五、七言絕句僅各 3 首,是相互呼應的,加上沈德潛於《凡例》論及唐代詩家不能“諸體兼善”,也特別以杜甫絕句“少唱歎之音”為例證,《別裁集》選評杜甫絕句時,也指明:“少陵絕句,直抒胸臆,自大家氣度,然以為正聲則未也。”(卷 20,頁 4a),在在顯示沈德潛確實是認同“杜甫不工絕句”¹⁵

15 杜甫“絕句不工”、“不足多法”的論點,明、清詩話多有論及。如明人胡應麟即有“子美於絕句無所解,不必法也。”之說。見氏著:《詩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內編卷 6,頁 109。明人許學夷亦引王世貞所言:“子美七言絕變體,間為之可耳,不足多法也。”隨後並提出己見:“子美七言絕雖是變體,然其聲調實為唐人《竹枝》先倡……惟(轉下頁)

的論點的。

其次，對照表格一李白入選個位數的詩體來看，計有：七律 4 首，五排 5 首，五絕 5 首，比對沈德潛在《凡例》所條列的各體代表詩家，李白在七律與五排都被刻意略過不提，唯獨“五絕”一體，與王維、韋應物並稱。觀《別裁集》評論李白絕句所云：“五言絕，右丞、供奉；七言絕，龍標、供奉，妙絕古今，別有天地。”（卷 20，頁 1a），可見李白五絕選錄雖少，評價卻頗高，並不能謂之不工。但李白的七律與五排，在《別裁集》確實選錄偏低，評語也多就李白“以古筆為律體”¹⁶的特色而發。

進一步比較李白的五排與七律，五排猶可與杜甫、王維頡頏、雁行，¹⁷位居選本五排選錄數量的第三名，且《凡例》或選本中也未有對李白“五排”的負面批評。唯獨七律，在李白傳世的詩集中僅餘 8 首，且誠如葛景春所言：“八首之中只有《送賀監歸四明應制》和《題雍丘崔明府丹灶》二首完全合律，其他六首不是有古風的句子就是失粘。”¹⁸李白七律所以不工者在此。明、清詩話遂多將

（接上頁）五言絕失之太重，不足多法耳。”見氏著：《詩源辯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年），卷 19，頁 220。清人張謙宜亦云：“（絕句）法莫備於唐人，中晚尤妙，但不當學少陵絕句，彼是變格。”之說，見氏著：《覲齋詩談》，卷 2，郭紹虞輯：《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頁 807。清人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也主張：“少陵絕句，《逢龜年》一首而外，皆不能工，正不必曲為之說。”見《清詩話續編》，頁 1562。

16 沈德潛評李白七律《鸚鵡洲》云：“以古筆為律詩，盛唐人每有之，大歷後此調不復彈矣。”《別裁集》，卷 13，頁 15b。觀詩中首二聯有“鸚鵡來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不僅對仗不工，對黏不合，加以“鸚鵡”重複三次之多，確實有“以古筆為七律”的特質。此外，於李白五排《送儲邕之武昌》後評中，亦有：“以古風起法運作長律，太白天才，不拘繩墨乃爾。”於《秋日登揚州西靈塔》後評，再度指出：“入手高超，能以古筆為律體。”《別裁集》，卷 13，頁 19a—b。評語中雖然沒有太多指責之意，但以律詩的學習典範而言，終究不足為法。

17 沈德潛於《別裁集·凡例》並未特別論及李白與王維五排成就，但選錄數量則依序為杜甫 18 首、王維 10 首、李白 5 首，此舉與明、清詩話論及五排，多以杜甫居冠，王維高於李白的評價是相當的。如明人胡應麟云：“盛唐排律，杜外，右丞為冠，太白次之。”《詩藪》內編卷 4，頁 77。清人宋犖論唐人排律亦云：“《品彙》以太白、摩詰揭為正宗，錢起、劉長卿錄為接武，均之不愧當家。……若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惟少陵一人而已。”見氏著：《漫堂說詩》，丁福保輯：《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頁 418；而清人葉矯然也主張：“唐人排律……盛則右丞尤在青蓮之上，亦以逸不可及。至杜公廣大神通，壓古軼今，岑、高諸人無敢望其項背。”見氏著：《龍性堂詩話·續集》，《清詩話續編》，頁 1040。

18 葛景春：《李杜之變與唐代文化轉型》（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 年），頁 85。

李白七律歸於“變體”¹⁹一派,不足多法。由《別裁集》卷前《凡例》論七律代表詩家時,隻字未提李白,評李白七律,也指出其有“以古筆爲律”(卷13,頁15b)的特質,可見沈德潛雖未明言李白“七律不工”,實亦有以其七律爲變體之意。但《別裁集》於李白現存8首七律選錄4首,入選比例頗高,推論箇中緣由,應有“因人存詩”之意在,猶如杜甫絕句即使不工,《別裁集》同樣選錄杜甫五、七言絕各3首;又如《孟浩然集》現存七律僅有4首,²⁰評價亦不高,²¹沈德潛仍然選錄《登安陽城樓》1首,應該也是基於“因人存詩”所致,並藉由“諸體兼選”的方式,形塑孟浩然足以和王維並稱“王、孟”的詩學意義。

由於“諸體兼善”必須以“無任何詩體不工”爲前提,既然杜甫“不工絕句”,李白“不工七律”,然則《別裁集》中“諸體兼善”的可能人選,僅餘王維一人。

(二) 王維在《別裁集》中的諸體選評情形

檢視王維詩在表格一的選錄情形,除了七絕僅錄4首,七古選錄9首,其餘詩體都有兩位數以上的入選量。這是否可以得出:沈德潛認爲“王維不工七絕與七古”的結論呢?實則未必!

沈德潛在《別裁集·凡例》論及唐代長於七古與七絕的名家中,皆可見

-
- 19 明人許學夷論李白七律時,先引王世貞之言:“太白之七言律,變體,不足多法。”其後另附按語:“太白七言律,集中僅得八篇。駘蕩自然,不假雕飾,雖入小變,要亦非淺才可到也。”見《詩源辯體》,卷18,頁205。許學夷按語雖頗有迴護李白之意,卻仍不得不承認李白七律爲“變”體。清人趙翼也指出李白詩集中,“古詩多,律詩少”的現象,且“七言亦多絕句,而律詩猶少”,與孟浩然同樣“不專以此(指七律)見長也。”見氏著:《甌北詩話》,《清詩話續編》,頁1139、1341。
- 20 孟浩然現存4首七律,分別爲:《登安陽城樓》、《歲除夜有懷》、《登萬歲樓》、《春情》。參見孟浩然著,徐鵬編校:《孟浩然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278—281。
- 21 明胡震亨曾言:“盛唐名家稱王、孟、高、岑,獨七言律挑孟,進李頎,應稱王、李、岑、高云。”將孟浩然排除在七言律詩名家之列。見氏著:《唐音癸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10,頁93。明人許學夷綜論孟浩然詩作,也指出:“孟浩然古、律之詩,五言爲勝。”並引用王世貞之言:“浩然句不能出五字外,篇不能出四十字外,此其所短。”許學夷以爲此說“深得之矣”。參見《詩源辯體》,卷16,頁163。此外,清人趙翼也基於李白、孟浩然詩集中的七律創作量少,故而推論二人“尚不專以此見長也”。參見《甌北詩話》,《清詩話續編》,頁1341。

王維的身影，選本中論及王維七古時，也指出其工於“隊仗”，具盛唐詩之特質，兼有門徑可尋；²²選評高適七古時，更連帶指出：“李、杜外，高、岑、王、李，七言古中最矯健者。”（卷5，頁12b）。可見王維七古雖然未能如李白般“鞭撻海岳”，或如杜甫般“沈雄激壯”，僅與李頎、高適、岑參並列為唐人七古四體之一，“以馳騁有餘，安詳合度”著稱，但無論如何，仍是有足以稱“善”的特點。

七古之外，王維七絕在《別裁集》僅選入4首，《凡例》也以“悽惋之調”一語概括之，似乎不甚著意。但王維長於七絕，實為後世諸家所盛稱，²³《別裁集》也援引王士禛（字漁洋，1634—1711）標舉王維《送元二使安西》為“七絕壓卷”，²⁴可見沈德潛並無貶抑王維七絕之意。結合王維七絕在《別裁集》的選錄數量偏低，但在五絕的選錄卻高達16首，遠邁其他詩家所常見的一至二首的情況來看，應是沈德潛有意調節王維絕句的入選總量，避免王維的絕句有選錄過多之嫌。猶如李白雖然五、七言絕並長，其七絕在《別裁集》中選錄20首，高居選本之冠，但於五絕一體卻僅選錄5首，明顯可見沈德潛刻意分配、調整各家入選量的痕跡，據此可見，王維的五絕與李白七絕，雖然同樣選錄偏低，卻未必是不工所致。

此外，表格三的“五排”一體，王維雖未列入代表詩家名單。但以入選數量而言，《別裁集》選錄王維五排10首，僅次於杜甫的18首，高於李白的5首，與

22 沈德潛評《老將行》云：“此種詩，純以隊仗勝。學詩者不能從李、杜入，右丞、常侍（高適），自有門徑可尋。”《別裁集》，卷5，頁26b；評《同崔傅答賢弟》則云：“寓疏蕩於隊仗之中，此盛唐人身分。”《別裁集》，卷5，頁28b。

23 觀明、清詩家論及“唐人七絕壓卷”時，王維《送元二使安西》（又名《渭城曲》）即為熱門討論名單之一，加以七絕尚語近情遙、含蓄不露，王維七絕多能近之，故而常與李白、王昌齡並稱，如清人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序例》論“七絕”代表詩家云：“摩詰、少伯、太白三家，鼎足而立，美不勝收。”《清詩話續編》，頁1561。又如高步瀛綜論“絕句”亦云：“盛唐摩詰、龍標、太白尤能擅長。”參見氏著：《唐宋詩學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卷8，頁752。

24 沈德潛於王之渙《涼州詞》後評中，援引李攀龍、王世貞、王士禛等人對“七絕壓卷”的看法，由於討論的詩作集中在盛唐，沈德潛遂補列中、晚唐詩家名作，如李益“回樂峰前”（《夜上受降城聞笛》）；劉禹錫“山圍故國”（《石頭城》）；杜牧“煙籠寒水”（《泊秦淮》）；鄭谷“揚子江頭”（《淮上與友人別》）作為接武盛唐之作，詳見《別裁集》，卷19，頁27a。

明、清詩話論及五排，多以杜甫居冠，王維其次，李白又居次的評價是相當的。何況王維五排雖然未能如杜甫般“瑰奇宏麗，變動開合”（《別裁集·凡例》），但誠如清人李因培（1717—1767）《唐詩觀瀾集》所謂：

右丞五排，秀色外腴，灑氣內充，由其天才敏妙，盡得風流，氣骨遂為所掩，一變而入郎錢，秀麗勝而沈厚之氣亦減，此風氣之一關也。²⁵

王維五排“秀色外腴，灑氣內充”的特質，實亦有足以名世動人之處，《別裁集》卷前《凡例》雖未特別提及，但以選錄數量與歷來評論而言，王維的五排確實是足以名世、稱善的。

要之，由“諸體兼善”的角度來看，杜甫絕句在《別裁集》的選錄偏低，沈德潛也以其“少唱歎之音”而列為唐代詩家“不能諸體兼善”的例證。另一方面，李白七律因創作量少，加以多運古體入律而被視為“變體”，不足多法，沈德潛《別裁集》雖刻意選錄4首以存其詩，但七律仍是李白未能稱“善”的詩體。相形之下，沈德潛在《別裁集》卷前《凡例》中，雖未將王維五排列入代表詩家名單，但選錄數量僅次於杜甫；七絕雖僅選錄4首，應是有意中和、調節王維五絕選錄過多所致。透過以上層層篩選，可見《別裁集》中的五排與七絕，並非王維未能兼“善”的詩體。

釐清了王維的五排、七絕在《別裁集》選錄雖然偏低，並非王維不“善”所致後，綜觀《別裁集》中，也屢見論及王維各體詩之殊勝處，如：

意太深，氣太渾，色太濃，詩家一病，故曰穆如清風。右丞詩每從不著力處得之。（王維五古總論，卷1，頁10b）

寓疏蕩於隊仗之中，此盛唐人身分。（七古《同崔傅答賢弟》，卷5，頁28b）

25 清人李因培：《唐詩觀瀾集》評王維《奉和聖製慶元元皇帝玉像之作應制》，卷10，頁20a。本書卷前標明為乾隆二十四年（己卯，1759）鐫板。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

此種詩，純以隊仗勝，學詩者不能從李、杜入，右丞、常侍，自有門徑可尋。
(七古《老將行》，卷5，頁26b)

右丞五言律有二種，一種以清遠勝，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是也；
一種以雄渾勝，如“天官動將星，漢地柳條青”是也，當分別觀之。(王維
五律總論，卷9，頁17b)

章法句法字法，俱臻絕頂，盛唐詩中亦不多見。(五律《觀獵》後評，卷9，
頁24a)

(七律)詩貴一語百媚，大歷十子是也；尤貴一語百情，少陵、摩詰是也。
(卷14，頁15b，盧綸《長安春望》後評)

諸詠聲息臭味，迥出常格之外，任後人摹仿不到，其故難知。(五絕《鳥
鳴澗》後評，卷19，頁5a)

除了引文所列舉王維各體詩的正面評論之外，沈德潛論及其他詩家創作時，也屢以王維作為評斷的基準。如論孟浩然五律“從靜悟得之，故語淡而味終不薄”，但與王維的渾厚相較，“尚非魯、衛”(卷1，頁16b)，是未足與王維並駕齊驅的；評高適七古，也再度標舉“高、岑、王、李”四家是“七言古中最矯健者”(卷5，頁12b)；論李頎七律，雖稱其為“安和正聲”，但整體而論，又“難與少陵、右丞比肩”(卷13，頁10a)，可見王維與杜甫才是七律的當行本色。

綜觀沈德潛對王維諸體詩稱“善”之論，洵非一家之言，可謂有識之見。印證清人牟願相(?—?)《小澗草堂雜論詩》所謂：“唐人諸體詩都臻工妙者，惟王摩詰一人”，²⁶認為王維是唐代詩家中唯一“諸體工妙”者；此外，歸納乾隆年間管世銘(1738—1798)《讀雪山房唐詩序例》對王維各體詩之評論，實亦有“王維兼善諸體詩”之意，其云：

(五古)詩境究貴在悟，五言尤然。王維、孟浩然逸才妙悟，笙磬同音。
並時劉昫、常建、李頎、王昌齡、丘為、綦毋潛、儲光羲之徒，遙相應和，

²⁶ 清人牟願相：《小澗草堂雜論詩》，見《清詩話續編》，頁918。

共一宗風，正始之音，于茲為盛。（《清詩話續編》，頁 1545）

（七古）王摩詰善能錯綜子史，而言不欲盡，詞旨溫麗，音節鏗鏘，蔚然為一朝冠冕。（《清詩話續編》，頁 1548）

（五律）“藍田日暖，良玉生煙”，此最五言勝境也。王摩詰殆篇篇不愧此意。（《清詩話續編》，頁 1550）

（七律）王右丞精深華妙，獨出冠時，終唐之世，與少陵分席而坐者，一人而已矣。（《清詩話續編》，頁 1553）

（五排）王摩詰之春容，李青蓮之灑落，岑嘉州之奇警，高適夫之沈著，長律中缺一不可。（《清詩話續編》，頁 1559）

（五絕）王維妙悟，李白天才，即以五言絕句一體論之，亦古今之岱、華也。（《清詩話續編》，頁 1560）

（七絕）摩詰、少伯、太白三家，鼎足而立，美不勝收。（《清詩話續編》，頁 1561）

儘管王維在以上諸體詩的成就並非“獨冠”全唐，而是與其他詩家並稱或鼎立，但就引文中的七種詩體評價來看，王維確實無愧於“諸體兼善”的名號。相形之下，管世銘也特別指出李白的七律與五排“寥寥數篇而已”，而杜甫即使在七古、七律與五排的成就稱得上是“古今無兩”，但若以絕句而論，“《逢龜年》（按：指《江南逢李龜年》）一首而外，皆不能工，正不必曲為之說。”²⁷在在呼應了“李白七律不工”、“杜甫絕句不工”及“王維諸體兼善”的論點。

四、“諸體兼善”的王維詩，何以在 《別裁集》入選量次於李、杜？

由於選本中的“諸體兼善”者，必須以“諸體兼選”為前提，筆者遂先由《別

²⁷ 以上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序例》論李白律詩，見《清詩話續編》，頁 1559；論杜詩七古、七律與五排三種詩體部分，見《清詩話續編》，頁 1559；論杜甫絕句部分，見《清詩話續編》，頁 1562。

裁集》諸體兼選的九位詩家進行檢視，篩選出選本中“諸體兼選”卻未必能“兼善”的六位詩家：岑參、劉長卿、柳宗元、孟浩然、錢起、高適，再由“杜甫不工絕句”與“李白七律質量偏低”的條件，將李、杜兩家剔除在“諸體兼善”的名單之外，緊接著歸納《別裁集》中對王維各體詩的選評要點，從而得出：王維才是《別裁集》中足以符膺“諸體兼善”的詩家。

但令人不免存疑的是：王維若是《別裁集》中唯一“諸體兼善”的詩人，何以詩作在《別裁集》的入選數量，卻是低於杜、李兩家而屈居第三呢？

首先，就選詩理念而言，沈德潛於《重訂唐詩別裁集序》即表明其編選宗旨：“要藉以扶掖雅正，使人知唐詩中有鯨魚碧海、巨刃摩天之觀”，而唐代詩家中最足以展現鯨魚碧海、巨刃摩天之觀者，莫過於李白、杜甫兩家。卷前《凡例》故而倡言：“是集以李、杜為宗”，冀能有別於康熙年間王士禛所編選的《唐賢三昧集》所謂：“取司空表聖‘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嚴滄浪‘羚羊掛角，無跡可求’之意”。由於論詩專主“神韻”，王士禛選錄最多的前兩位詩人是王維、孟浩然，李、杜兩家詩則被排除在外。儘管沈德潛在序文中自言：“新城（指王士禛）所取，亦兼及焉。”並未刻意貶抑王士禛的選詩理念，甚至兼取《唐賢三昧集》的選詩旨趣，但《別裁集》畢竟是一本“以李、杜為宗”的唐詩選本，也因此，書中以杜甫、李白詩選錄總數居於前兩名，王維入選量則墊於兩家之後，應該是可以理解的。

再者，比對表格三所條列的杜、李、王三家詩評語，可見王維雖然“諸體兼善”，但因多處於各種詩體的發展階段，遂常與諸家分席、並列。如五古與孟浩然、儲光羲、韋應物、柳宗元並為“學陶”者；七古與李頎、高適、岑參同屬“馳騁有餘，安詳合度”之一體；五律與李白、孟浩然“並推極勝”，七律也與李頎的“春容大雅”列為同調（引文請參見《凡例》）。相形之下，李、杜兩家（尤其是杜甫）的創作成就，則處於詩體發展的顛峰，極盡詩體變化之能事。歸納《別裁集·凡例》論李白五言古詩，謂其為唐人中“能復古者”，而杜甫“材力標舉，篇幅恢張，縱橫揮霍”的特質，改變了漢五古“優柔善入，婉而多風”的樣貌。至於七古，李白的“非人力可及”與杜甫盡洩“天地渾奧之氣”，自成一體，比其他詩家更加雄偉壯觀。此外，論杜甫五律為“獨開生面”、“超然拔萃”，七律為“一時盡

掩諸家”，五排更是“後此無能爲役”，堪稱是三種詩體中創作成就最高者。尤其是七律一體，沈德潛雖然有“少陵、右丞比肩”²⁸之言，但若以“七律連章體”而論，沈德潛認爲：

王摩詰七律，風格最高，復饒遠韻，爲唐代正宗，然遇杜《秋興》、《諸將》、《詠懷古跡》等篇，恐瞠乎其後，以杜能包王，王不能包杜也。（卷 13，頁 16a）

所謂“杜能包王，王不能包杜”，係有見於杜甫連章七律的開創性，實有王維所不能及者。何況若以七律創作數量而論，王維詩集僅存 20 首，杜甫卻高達 151 首，²⁹兩者相差數倍。另一面，儘管王維未有“不工”的詩體，但除了絕句一體極盡精妙之能事外，其他多處於唐詩發展階段，承先之力有餘，開創之功則嫌不足，反映在《別裁集》選詩總量上，王維的 104 首，遂不得不殿於杜甫的 255 首、李白的 140 首之後，由此不難理解，清人賀裳（—1681—）何以有：“唐無李、杜，摩詰便應首推”³⁰的慨嘆，但也正因有杜、李的變動開闢、超然拔萃，集各種詩體變化之能事，以致王維縱能“諸體兼善”，終究不及杜、李兩家的登峰造極、雄偉可觀。³¹

另一個必須釐清的問題是，自北宋秦觀（1049—1100）標舉杜詩爲“集大成”，³²

28 沈德潛將王維與杜甫七律並稱，觀其論李頎七律云：“東川七律，故難與少陵、右丞比肩，然自是安和正聲。”《別裁集》，卷 13，頁 10a。此外，評論盧綸《長安春望》，也有：“（七律）貴一語百情，少陵、摩詰是也。”《別裁集》，卷 14，頁 15b。

29 王維七律數量，係按清趙殿成：《王右丞集箋注》（臺北：中華書局，1985 年）一書進行統計，而杜甫七律數量，則以清浦起龍：《讀杜心解》（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一書爲準。

30 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論王維，見《清詩話續編》，頁 309。

31 明人胡應麟論唐代七言歌行發展，指出：“高、岑、王、李，音節鮮明，情致委折，濃纖修短，得衷合度，暢乎，然而未大也。太白、少陵，大而化矣，能事畢矣。”認爲連同王維在內的“王、李、高、岑”四家，仍處於七言歌行的發展階段，所謂“未大也”，主張七言歌行的發展極致，仍應歸結於杜、李兩家。見《詩藪》，內編卷 3，頁 50。

32 秦觀《韓愈論》云：“杜子美之於詩，實積衆家之長，適其時而已。……嗚呼，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成者歟！”見徐培均箋注：《淮海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卷 22，頁 751—752。

南宋楊萬里(1127—1206)又推尊杜甫為“詩聖”，³³秦、楊兩人之說深植人心後，難免讓人產生杜詩“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的印象，與“杜甫不工絕句”的事實是有落差的，也與王維“諸體兼善”的評價扞格、牴觸，究竟“集大成”與“諸體兼善”在本質上有何不同呢？

深入探究秦觀所論杜詩之“集大成”內容：

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沖澹，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³⁴

引文中的高妙、豪逸、沖澹、峻潔、藻麗等詞彙，都是針對詩作的創作風格立論，故秦觀謂杜詩能“集諸家之長”，是指杜詩兼具前代詩家創作風格的特質。但“諸體兼善”所著重的，是詩家能否兼擅古、近體詩的創作要點。³⁵換言之，杜詩之“集大成”是就詩作風格而論，乃推崇杜甫能兼具前代各家詩作的風格、特色。但若由“諸體兼善”的角度立論，既然杜甫不擅長絕句，也就稱不上是“諸體兼善”了。從而可知：杜甫詩之“集大成”，與王維詩之“諸體兼善”，既然兩者指涉的內容不同，也就不存在語意矛盾或牴觸的問題了。

五、結 論

《別裁集》是一本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排、五絕、七絕共七種詩體分

33 楊萬里《江西宗派詩序》云：“蘇、李之詩，子列子之御風也；杜、黃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於詩者歟？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歟？”見氏著：《誠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卷79，頁12。

34 秦觀：《韓愈論》，《淮海集箋注》，卷22，頁751—752。

35 《別裁集·凡例》論五古之“優柔善入，婉而多風”；初唐七古之“風調可歌”；七律“平敘易於徑直，雕鏤失之佻巧”；五言長律之“貴嚴整，貴勻稱，貴屬對工切，貴血脈動蕩”；與論七絕之“貴言微旨遠，語淺情深”，都是就各種詩體的創作要點而發。

卷編次的唐詩選本，爲了讓讀者透過選本掌握不同詩體的創作要點，沈德潛對唐代詩家採取了“錄其所長，遺其所短”的選詩策略，亦即各種詩體分別選錄足以爲式的詩家，作爲“學詩者發軔之助”（《別裁集·凡例》），從中亦可得見沈德潛對唐代詩家創作成就的品評與論斷。

本文由沈德潛在《別裁集》卷前《凡例》所謂：“唐人詩，無論大家名家，不能諸體兼善”說延伸探討：倘若唐人詩確如沈德潛所言，並未有能“兼善”各種詩體的詩人，何以《別裁集》在分卷的七種詩體中，有高達九位詩家有“各體兼選”，亦即每種詩體都至少選錄一首的情形？本文透過選本《凡例》與相關評語進行爬梳後發現：杜、李、王以外的六位詩人，存在著“詩家並稱”或“因人存詩”等因素，加以《別裁集》選本規模龐大，選詩數量近兩千首，導致選本中有多位詩家出現“諸體兼選”的情形。

然而，“諸體兼選”所重者在“選”，“諸體兼善”則是各種詩體皆能稱善，至少不能有負評爲前提。進一步比對《別裁集》的相關評語後發現：杜甫有“絕句不工”之論，李白七律有“以古筆爲律”之目，因而杜甫的五、七言絕在《別裁集》中僅各錄3首，李白的七律也只收4首，可見《別裁集》中唯一符合“諸體兼選”且無“不工”之目者，唯有王維一人。但由於王維的詩歌創作成就，多處於詩體發展階段，未能如杜、李兩家已臻詩體發展之大觀，是以常見沈德潛將王維與其他詩家並美、共稱；加上《別裁集》是一本“以李、杜爲宗”的選本，王維詩的整體入選量與在選本中的地位，遂不免爲杜、李兩家所掩，讓人忽略了王維諸體詩“皆臻工妙”的特長。

大體而言，明、清時期的唐詩選本，除了康熙年間王士禛的《唐賢三昧集》，因刻意不選李、杜改尊王、孟，以致王維詩在《唐賢三昧集》選錄最多，成爲明、清時期的唐詩選本特例，其餘諸家所選的王維詩，多位於杜、李兩家之後，殿居第三，或者與李白並列第二。除了本文所討論的《別裁集》之外，其他如明代李攀龍（1514—1570）《古今詩刪·唐詩選》，晚明鍾惺（1581—1624）、譚元春（1586—1637）合選的《唐詩歸》，明清之際的唐汝詢《唐詩解》，王夫之（1619—1692）《唐詩評選》，清初王堯衢《唐詩合解》，乾隆年間宋宗元《網師園唐詩箋》、楊逢春（1709—？）《唐詩繹》，孫洙（1711—1778）《唐詩三百首》，甚至民初

的高步瀛(1873—1940)《唐宋詩舉要》之“唐詩選”部分,都是形成杜甫、李白、王維鼎立三強的局面。表面上,王維似乎屈居於杜、李之下,但王維現存詩作僅374首,³⁶遠低於杜甫詩集的1458首與李白詩集的987首,³⁷仍足以和杜、李並列三強,可見其詩作的重要性與藝術性,實頗受詩評家的青睞。透過唐詩選本來重新省視、定位王維詩作,應不失為一條具體可行的徑路。

(作者:臺灣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

³⁶ 數量統計,係參考趙殿成:《王右丞集箋注》,其中王維五古112首,七古22首,五律103首,七律20首,五排40首,五絕48首,六絕7首,七絕22首,合計374首。

³⁷ 杜、李兩家現存詩作數量,因有逸詩或偽作的爭議,加以不同版本所得的數據也略有不同,杜甫詩1458首是按清人浦起龍《讀杜心解》所統計的數據,而李白詩987首,則是參考清人王琦輯注《李太白集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06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統計而得。

引用書目

專書

- 王維著,趙殿成箋注:《王右丞集箋注》。臺北:中華書局,1985年。
- 牟願相:《小澗草堂雜論詩》,郭紹虞輯《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宋棻:《漫堂說詩》,丁福保輯:《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 李白著,王琦輯注:《李太白集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06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李因培:《唐詩觀瀾集》,乾隆二十四年(1759)鐫板,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數位典藏。
- 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初刻本,康熙五十六年(1717)碧梧書屋藏板,臺北故宮博物院善本古籍庫館藏。
- 沈德潛:《唐詩別裁集》重訂本。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7年。
- 孟浩然著,徐鵬校注:《孟浩然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
- 胡震亨:《唐音癸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胡應麟:《詩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 孫洙原編,陳婉俊補注:《唐詩三百首》。北京:中國書店,1991年。
- 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
- 浦起龍:《讀杜心解》。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高步瀛:《唐宋詩學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 秦觀著,徐培均箋注:《淮海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 張謙宜:《緝齋詩談》,郭紹虞輯:《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許學夷:《詩源辯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
- 陳伯海:《唐詩總集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郭紹虞輯:《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賀裳:《載酒園詩話》,郭紹虞輯:《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葛景春:《李杜之變與唐代文化轉型》。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
- 楊萬里:《誠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
- 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序例》,郭紹虞輯:《清詩話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A Study of the Theory of “Proficiency in All Poetic Forms” in *Tangshi biecai ji*

Chen Mei-Ch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General Rubrics” of his *Tangshi biecai ji*, Shen Deqian (1673 – 1969) states that “no Tang poet, even a prominent one, was proficient in all poetic (*shi*) forms.” To support this statement, Shen gives examples such as Du Fu (712 – 770), Wei Yingwu (737 – 792), Liu Yuxi (772 – 842), and Han Yu (768 – 824), who were respectively not good at writing quatrains, heptasyllabic verse, ancient-style verse, and recent-style verse. This viewpoint is consistently found in the first print of this anthology and remained intact in the revised edition.

A careful examination of the anthology, however, reveals some ambivalence. In the first print, there are up to ten poets whose works in all poetic forms are anthologized; in the revised edition there are nine such cases. One cannot help but cast doubt on Shen’s view that “no Tang poet was proficient in all poetic forms.” Moreover, based on the “General Rubrics” and other remarks in his book, Shen makes no negative comments on Wang Wei’s compositions in all poetic forms. Then why did Shen anthologize fewer poems by Wang Wei than those by Du Fu and Li Bai (701 – 762)? In addition,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roficiency in all poetic forms” and “convergence of great perfection,” a common praise of Du Fu’s poetic achieve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heory of “proficiency in all poetic forms” in its discussion of this influential anthology. In addition, it also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and commentary on the image of Wang Wei as presented in the anthology, which takes Li Bai and Du Fu as models.

Keywords: Shen Deqian; *Tangshi biecai ji*; Wang Wei; “proficiency in all poetic forms”; distinguishing poetic forms